



## 推进都市圈一体化发展

张迪

区域经济增长体现了一个区域经济实力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能力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增长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增长区域化形势日趋明显,对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研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热点。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扩散,都市圈成为我国产业、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社会经济要素的集中分布区。其发展不仅牵动着整个国家和区域的经济,也将对世界经济运行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在新的经济形势下,都市圈经济发展大有可为。其中京津冀都市圈与长三角都市圈在地理区位、自然资源条件、资本和技术条件上有着较大的区别,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以及产业结构布局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且两大都市圈都不同程度地面临限制区域经济增长的问题。

京津冀都市圈地处东北亚的中心,位于我国华北平原的北隅。从区位来看,京津冀都市圈内就有两个超大城市,即北京和天津。以北京和天津为双核的城市聚集效应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京津两市将带动河北省沿海及内陆城市的快速发展,该都市圈有望形成中国乃至世界上城市区、工业区、港口区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也将是我国未来继续大规模推进国际化的重点地区。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本质不在于数量和速度的增长,而在于结构和质态的优化。对于京津冀都市圈,提升整个区域的竞争力重在产业对接与产业异构。通过实证和综合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缩小京津冀两市一省间现存的经济差异是提升京津冀都市圈竞争力的重中之重,而对于改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河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将是京津冀都市圈健康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一是构建河北制造基地,为京津提供支持。基于河北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以及京津两地高速发展的背景,河北地区可作为京津两地的制造业基地,为京津制造业发展提供中高水平的服务和支撑。建议河北省瞄准京津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持续提高现有优势产业的竞争能力,一方面发挥京津工业企业外迁所带来的拉动效应,另一方面与外部加工贸易型企业对接,发挥自身各种资源优势,形成新的制造业高地。

二是构建物流配送基地,实现京津冀无缝链接。北京的国际化水平与天津港的物流优势,形成了环京津的现代物流中心,随着首都经济圈的迅速发展和交通设施的日臻完善,环京津各市将面临一个较大的物流市场。物流基地的建设将与京津的配送能力实现网络对接和深度整合,进而更好地发挥承载作用,实现环京津区域的快速发展。

三是加快产业合作与梯度转移的相关平台建设。要通过重点协作工程加快平台的网络建设步伐。建议针对河北目前资源的特点,尤其是科技资源的配置特点,通过三省市重点合作工程的带动、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平台。通过平台建设,发挥“窗口效应”,以稳定的合作渠道为支撑,促进当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此外,还要在加强政策引导的基础上,积极通过经济实力的内在提升,综合解决一体化进程的相关问题,最终实现当地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

近年来,长三角都市圈凭借明显的区位优势和雄厚的经济基础,获得了很多国际资本的高度青睐;加之城市群密集,人力资本雄厚,又有长江流域广阔的腹地及通航力,使长三角都市圈日渐形成了统一开放的区域共同市场。当然,长三角都市圈虽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and 雄厚的经济基础,但仍有不足之处,在以后的产业合理布局与分工中应围绕市场化、合理化、专业化、可持续发展等原则,积极推进区域内全方位合作,从而实现一体化发展。

一是积极发挥市场作用,促进区域产业链有效发展。要支持实行区域内产业的整合,让产业资源形成有机、关联、有序、合理的流动,形成具有长三角产业主体特征的纵向产业链,以及具有长三角经济联动发展特征的横向产业链,从而使整个区域产业结构得到共同的、有效率的发展。

二是积极推进增量错位发展,提高区域产业整体优势。支持长三角地区新增产业的产业链合作与集群发展,推动区域产业增量发展,以突出错位为主线,进一步形成各个城市的产业特色和产业优势,形成接受国际产业转移的合力。

三是积极鼓励存量配套合作,推动市场要素区域间流动。鼓励长三角地区消除阻碍产业合作与企业流动的壁垒,以增强辐射能力为主线,重点推动区域内的产业链配套合作,鼓励企业联合重组;同时,也应防止低附加值、有污染的产业转移。

四是积极实施分类指导,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于大产业、大基地、大项目,可探索建立国家部委、省、市之间定期通报机制;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产业,支持建立和完善两省一市联合产权交易市场,以引导、鼓励、支持企业进行产业链间的合作、重组、并购,引导建立行业之间、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利益纽带。

五是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提升区域综合服务功能。大力支持“长三角”地区发展现代服务业,将金融、物流、航运等现代服务业重大项目优先布局在“长三角”地区;支持长三角地区深化金融改革与创新,扩大金融改革试点;积极构建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的长三角港口群,推动长三角港口的一体化发展。

六是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支持苏浙沪围绕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率先进行改革探索,强化区域宏观政策引导、市场监督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从而真正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总之,在区域不断发展的当下,对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都市圈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对于进一步发挥率先经济区域化地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对构建区域综合治理结构、合理配置影响经济区域化进程的各种主要结构因素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对进一步完善区域政策、区域规划,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等方面的积极性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本版编辑 欧阳优

邮箱: jrbj@sina.com

# 营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

李留存

在经济发展形势错综复杂的今天,能不能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发挥好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为企业营造一个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良好环境,不仅关系到企业活力的焕发,而且关系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大局。

## 热点思考

最近,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为下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营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指明了方向。

### (一)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不断推进无疑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从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从根本上解除了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束缚,到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再到《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再到党的十八大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部署……这些年来,市场化改革的不断突破,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激发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这不仅体现在30多年来年均9%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上,还体现在每个中国人点点滴滴的生活变化中,更体现在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中。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飞速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作用愈加凸显。现在,我国私营企业已达1025万户,个体工商户达3896万户;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比重超过60%,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和90%的新增就业岗位,国内生产总值贡献超过60%,税收贡献超过50%。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不断壮大,其中私营企业出资人和个体工商户达6000万,一批代表人士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可以说,没有30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就不可能有非公有制经济今天的繁荣。

### (二)

企业是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源泉。企业竞争力是衡量国际竞争力的核心。目前,我国企业总数已达上千万家,也涌现出一些走向国际的企业,但与发达国家国家水平相比,在经营效益、研发投入、规模经济、分工协作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这里面既有企业自己的原因,有起步不同的原因,也有市场环境还不完善的原因。

就市场环境而言,总的来说,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企业发展的条件更好、基础更实,但一些问题也不容回避。比如,民营企业的投融资环境还有待改善。尽管我国先后出台了两个“36”条,但由于种种原因,“玻璃门”、“弹簧门”的问题仍时有发生,民间投资仍存在有钱无处投、想进进不去的现象。有时候,企业新上一个项目,要经过几十个部门、几十个环节,时间长达6至10个月,这显然会影响企业投资创业的积极性。为此,要下决心进一步打开转变政府职能这扇大门,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和创造力。这对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无疑是不花钱能办事、少花钱多办事的“良方”。

进一步看,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十分复杂,传统红利优势已经越来越小,经济发展亟须上台阶,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迫在眉睫。这就要求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环境,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以良好市场环境激发企业发展活力、转型动力。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任何改革措施都应经过充分论证,而且必须有利于长远机制建设。

一是创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环境。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应对危机,使自己屹

立不倒的关键。把更大的力量放在发展实体经济上,首先要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在制度上给实体经济新的定位、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投资渠道。要进一步放开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使民间资本有信心、有条件专注于实业发展。地方政府要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把更多的政府资源投入到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去,并发挥“种子资源”的作用,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实体经济的投资与发展。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把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把完善金融监管与推动金融创新结合起来,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

二是要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有利于企业平等竞争发展环境。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要继续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破除体制障碍,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积极提供创业辅导、信息咨询、财税金融支持、法律帮助、员工培训等服务,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维护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切实加强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指导和引导。要抓紧清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取消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规定,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使他们在更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参与竞争。要相信市场机制的力量,必须转变职能、下放权力,下决心减少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打破市场分割与垄断,消除制约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使企业和产业在竞争中优化升级,为经济转型提供“源头活水”。

三是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努力创造有利于形成企业稳定预期的发展环境。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既要有应对当前问题的短期政策,更要有保持稳定的长期政策,决不能让一些临时性政策成

为长期发展的障碍。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相信市场机制的力量,更加突出规则的严肃性。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牢牢坚持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 (三)

政府要为市场发挥作用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同时还要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政府尤其需要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引导和推动。具体到一个地方来说,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政府要注重顶层设计,把区域规划、定位与市场规律、地方优势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发展开辟更广阔天地,这本身也是推进市场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

以位于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为例,其具有向西南开放的独特优势,拥有丰富的矿产、水能、生物等自然资源以及民族文化和旅游资源,发展潜力巨大。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云南省改革开放不断迈出新步伐,滇中城市群带动能力明显增强,区域自主发展能力明显提高,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具备了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基础条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云南应把握自身优势、瞄准“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要定位,进一步加强长期规划,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努力把云南打造成我国连接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陆路交通枢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西南地区的重要经济增长极。特别要通过经济规划等经济手段的引导,引导企业抓住机遇、健康发展。

当然,企业转型发展,既离不开良好的环境,更依赖于自身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要适应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需要,不断提高企业发展质量,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建立与发展环境的良性互动,从而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

## 发挥好城镇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朱敏

市场能够更好地发育,在城市能获得相对于农村工资更高的就业机会,并促进城镇服务业的蓬勃发展,进而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对于农民来说,随着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将会为农产品提供更大的消费市场,规模效益和价格水平也会得到根本改善,人均占有资源不足的矛盾会得到根本改变,收入的资源约束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政府支农效果也会显著提高,使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城市化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是保证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必要条件,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环境不断改善,进而会使消费领域不断拓展,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此外,伴随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和收入水平提高,城市需求包括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张,而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对农产品需求扩大,必然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扩大,促进城市工业及服务行业进一步发展,从而吸收更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由此形成消费需求的良性扩张和循环累积效应。

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化与消费的关系并不明显。一是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50%,按照国际一般规律,之后最终消费应随城镇化率的提高而上升,然而,2009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从46.6%提高到51.27%,最终消费率却不升反降。二是城乡居民消费倾向都趋下降。用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消费支出占其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表示的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由1978年的90.61%下降到2011年的69.51%;用农村家庭平均每人年消费性支出除以其人均年纯收入所得比值表示的农村消费倾

向,由1978年的86.87%下降到2011年的74.83%。此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下滑态势。

分析起来,我国城镇化不能有效拉动消费,根本原因还是出在体制上。我国城镇化在城市面积不断扩大的同时,相关体制改革如户籍、社保、土地流转等严重滞后,导致我国城镇化往往“见物不见人”,人口城镇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土地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化具有“有城无市”或“城与市”不协调的特征,阻碍了其消费拉动作用的充分发挥。特别是大量农民工由于体制原因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不能跟上城镇化步伐。我国在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投入明显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这些直接关系到居民生活质量的重大问题,助推了基于存钱买房、养老和防病等意愿的储蓄动机,削弱了本应释放的消费能量。同时,城市内部社会保障也存在“二元结构”,很多外来农民工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其消费需求因而受到严重制约。

为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解决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面积扩张过快、社会保障体系滞后和农民工市民化等问题,更好地发挥城镇化对消费的积极拉动作用,必须大力破除现有体制机制障碍,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上形成突破和进展,进而带动全局。

一是研究制定城镇化发展的专项规划。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充分表明,在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必须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规划、引导和调控职能。要统筹考虑全国城市布局,遵循市场规律,选择一批有发展潜力和产业支撑的中小城市纳

入规划。要考虑城市布局和发展阶段战略,在大中小城市、东中西部几个层面上避免城市的无序发展。此外,建议制定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总体规划原则,致力于解决城市绿地少、水土流失严重、大气污染严重、水环境质量差等问题。

二是加快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随着覆盖城乡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建议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鼓励离乡进城农民将原承包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这既有利于农民的非农转移,从而促进人口城镇化进程,又有利于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三是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在农民工落户问题上,应采取差别化政策:中小城市、小城镇应尽快取消实现稳定就业创业农民工的落户准入门槛;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应积极研究放宽相关政策,通过“积分落户”等办法,畅通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渠道。此外,我们还要在与户籍相挂钩的民政、教育、就业、劳动保障、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等制度方面加快配套改革,剥离在户籍上附加的各种利益,大力推进城乡、区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为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四是建立完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要通过研究论证,明确政府、企业和农民工的各自责任,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子女义务教育、就业扶持以及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补助力度,健全中央财政对农民工集中地区稳定、长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在此基础上按照低标准、广覆盖、可接续原则,着力推进农民工社保、住房、医疗等制度建设,最终形成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



“城镇化具有促进消费的积极效应。然而,我国城镇化与消费的关系并不明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相关体制改革没有同步跟上城镇化步伐。更好地发挥城镇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须大力破除现有体制机制障碍,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如户籍改革、社保改革上形成突破和进展,进而带动全局。”

城镇化具有促进消费的积极效应。研究表明,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将增加2.0083%。分析起来,城市化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以下几条渠道实现:

一方面,城市化会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对于城镇居民来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信息、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城市,将在城市产生巨大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使生产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